

* [西南历史文化研究]

主持人: 蓝 勇

主持人语:就历史地理的研究实践来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难征,上古的历史地理问题一直争论较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周宏伟教授发表《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提出地质时代在成都平原形成的断陷湖“滇池”延续到两晋南北朝仍然存在,称“万顷池”,对传统“滇池”名实一直在云南之说提出怀疑。周宏伟之说主要据文献为主,地质资料为辅。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里发表的郭声波教授《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认为通过对成都平原的地质、古地理环境分析以及考古学的分析,第四纪以来直到战国中期,成都平原不可能存在“周回二百余里”的大湖泊,“滇池”在成都平原之说不能成立。但周宏伟教授认为郭说没能解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同时发表《“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一文指出,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应为二事,所涉人物庄

蹻、庄豪并非一人;庄蹻入滇实为沿长江入蜀,庄豪入滇实为沿沅水入夜郎。此事的区别进而为滇池在先秦时期在成都平原提供又一证据。

学术争论是学术进步的推进器。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怀疑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探索,在许多地质材料基础上对于怀疑的质疑也显现了科学的求真精神。我认为,对此先秦历史地理问题,应该从历史文献、地质材料、考古材料三方面来研究,将理论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就以前我们已经有的研究来看,历史时期成都平原的水体面积肯定比现在大得多,但究竟有多大,是否就是历史时期的滇池?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诸多西南古史矛盾如何解释?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我们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考古发掘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故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来关心这个问题。

“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

——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

郭 声 波,鲁 延 召,许 之 标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周宏伟先生近年提出,地质时代在成都平原形成的断陷湖延续到两晋南北朝仍然存在,即汉代“方三百里”、“周回二百余里”的“滇池”,再到两晋南北朝的“万顷池”。通过对成都平原的地质、古地理环境分析以及考古学的分析,认为第四纪以来直到战国中期,成都平原不可能存在“周回二百余里”的大湖泊,“滇池”在成都平原之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滇池;成都平原;周宏伟;宝墩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047-07

一、问题的提起

上古时期(依周宏伟先生的文义,此“上古时期”即石器时期、青铜器时期以至于战国时期,本文也依此概念)的滇池地望,西汉以来就已成定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

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2993}。其后,《汉书》、《后汉书》皆转引于此,字词略有出入,大致一致。唐人对此记载的注也是认同这一点的,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滇池,方三百里。《地理志》:‘益州滇池县,泽在西

* 收稿日期:2008-05-14

作者简介:郭声波(1959-),男,四川泸州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及专门史。

北。’《后汉书》云：‘其池水源深广，而未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滇池。’”^{[1]2993}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滇池泽，在昆州晋宁县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广而未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滇池。’”^{[1]2993}皆指出滇池在今天的云南高原，这也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近年周宏伟先生提出“‘滇池’本在成都平原”^{[2]78-96}之说，立足于分析现代技术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提出战国后期以前的“滇池”必是在今成都平原。这就翻了一个惊天大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学术贵在创新，周先生的新见，无疑为我们的古史研究注入了一泓活水，有益于我们反思历史。可是我们按照周先生复原的成都平原的“滇池”地图，比照历史文献和古地理学、考古学资料，发现周先生所举证据往往可以有两种解释，即可以理解为成都平原有滇池，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滇池，有些“证据”则是望文附会或强作解释，真正能够支持其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几乎没有。因此，我们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不揣冒昧，想就其古地理学与考古学方面的论点进行一番商榷，希望能得到周先生的理解。

第一，在古地理学方面，周先生指出成都平原主体部分可能下伏三种地貌：隐伏单斜丘陵、隐伏方山丘陵、隐伏断陷湖盆。其中湖盆中心位于大邑、彭州东侧，延展方向北东与龙门及龙泉山两条断裂带的方向一致，长约90余千米，宽约10~25千米。隐伏单斜丘陵大致分布在绵竹、大邑以西的龙门山地带和德阳、成都一带。上述二者之间为隐伏方山丘陵分布区。隐伏地形之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至100多米，最厚可达300~400米的新生界地层。可见，地质历史上成都平原曾存在过一个由断层陷落而形成的湖泊。成都平原一级阶地的海拔高度一般为2~3米，两侧为4~6米，研究者根据C₁₄年龄测定其形成时间为距今2500~6700年，属于全新世。因此，可以说成都平原内部表层相当部分的一级阶地形成时间距今只有5000年以近。成都平原地势具有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历史时期成都平原如果有湖泊的话，位置最有可能是平原的东南部。

第二，在考古学上，周先生指出成都平原的考古调查结果可以为之提供旁证：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上进行过广泛的考古调查，但平原东南部地区，即指今成都西南部、双流西部、新津北部、崇州东部、温江南部地域，却一直没有唐以前遗存的任何报道，似乎在说明上古时期这一带很有可能是大片水域。

第三，周先生通过分析来敏《本蜀论》、扬雄《蜀王本纪》、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以及《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史料，并结合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做了推测：“地质时期的这个湖盆，进入近3000年的历史时期，除东南部一带仍有部分湖泊水体子遗之外，绝大部分应已淤为平地。”最后，考虑到目前发现的战国以前成都平原上古城遗址的分布情况，周先

生进一步指出：在战国中期，成都平原的“滇池”面积完全可能达到700平方千米以上，到了汉代，仍有“二百余里”大小，即在450平方千米左右。

如此一来，在石器及青铜器时期成都平原的“滇池”面积，要远远大于战国中期的面积。因为，成都平原地质时期的隐伏断陷湖盆，根据周先生提供的《成都平原隐伏地貌图》，我们可知其长度约100千米，宽度约10~30千米不等，其面积也在2000平方千米以上。我们与周先生所探讨的成都平原，指灌县、绵竹、罗江、金堂、新津、邛崃为边界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长约200千米，宽40~70千米，面积约在7000平方千米以上，它是一个由于地壳运动的继续下沉和河流夹带的泥沙长期堆积发育而成的复合扇形冲击平原^{[3]171}。那么，地质时期的湖盆约为成都平原近1/3的面积，不可不谓是个大湖泊。

然而，结合地质学、古地理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成都平原在战国中期不可能有如周先生所指出的大型湖泊，直至汉代也不可能存在450平方千米左右的大湖泊存在。

二、成都平原地质与环境分析

成都平原地质勘测发现的隐伏断陷湖盆，其发展生命期，值得探讨。在新生代或第四纪松散层堆积很厚的负地形区，现代地表形态完全没有或很少反映底部埋藏地形特征者，称为隐地形；隐地形表明松散层堆积较厚，是确定埋藏地形仍在下沉的重要标志；实际在下沉区的堆积平原上，河道多呈自由曲流形式，因此绝对的隐地形是很少的^{[4]51}。成都平原沉降中心地带在广汉—成都—双流—新津西北，及靠近龙门山前方位^[5]，也是隐伏湖盆所在位置，接纳了大量第四纪松散堆积物，致使湖盆地形变为隐伏。该地区在第四纪以前曾经是一个大的湖泊区域，这在地质分析上确实得到了证实。

通过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大量钻孔，发现“盆地底部为一套粗大碎屑的磨拉石沉积建造……其岩性特征，与盆地边缘汤家沟、大邑氮肥厂剖面之‘大邑砾岩’一致，为岩屑粗砂充填、间断性半—全胶结、砾卵石磨圆度和球度较好，分选性差的砾卵石层。具有典型的颗粒粗大、无沉积韵律的山前洪积相特征”^[6]。这表明第三纪末及第四纪以来的成都平原是山前洪积作用的产物。而湖泊的沉积作用下的沉积物却有着显著的特点，即以细组分的泥质沉积物为主，并含有丰富的生物物质和化学沉淀物；并且湖泊是相对较为平静的沉积环境，且湖中及湖岸会生长大量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秋冬季节大量死亡，在湖中形成生物沉积物，并保留较为完整的生物形态，因此湖成沉积物中常可以见到保存完好的生物化石^{[7]190}。这在成都平原的第三纪以前的地质年代里有所发现：

晚白垩世灌口组为内陆磨拉式山麓洪积

相砂岩建造及浅湖或咸水湖相砂、泥岩建造；与下伏夹关组整合接触；早第三纪古—始新世名山群、渐新世芦山组为湖相—咸水湖相的红色砂泥岩建造；分别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晚第三纪地层)仅见于峨眉平原的上第三系为富含古植物孢粉和炭化树杆的湖相沉积……此外,晚白垩世与早第三纪地层有一个富含膏盐的共同点,均为强氧化条件、干燥气候的浅湖相沉积环境^{[6]173}。

白垩纪时,在燕山运动影响下,(四川盆地)区内出现隆起与凹陷,局部遭受到剥蚀“堆平”,普遍出现红色碎屑及磨拉石堆积;大约在(第三纪)渐新世末喜山运动一期,四川盆地伴随青藏高原整体上升,致使原有沉积范围趋于“萎缩”消失,将沉积中心推移到峨眉一带,继后,地壳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上新世,沉积湖盆完全干枯消失^{[6]175}。如此一来,周先生所指出的隐伏断陷湖盆,其生命期大致可以知道,即,早于晚白垩世之前形成,至迟在第三纪上新世便消失。故而,我们认为周先生所指上古时期的“滇池”,绝不可能是地质时期湖泊的残余。

另,“根据岷江、沱江上游阶地年龄与成都平原阶地年龄的对比,结合成都平原中更新世晚期以来的沉积结构,物质成分和沉积环境的分析,倾向于成都平原的阶地沉积是岷江、沱江等主要水系进入成都平原的河流相沉积。……控制成都平原第四纪沉积分布的断裂活动时代似乎表明有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变新的基本规律,成都平原的形成过程则是平原中心断陷向两侧扩大的过程。”^{[5]3-6}此种情况与地质勘测到的隐伏断陷湖盆位置相合。同时,这也是形成今天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原因所在,即平原是在中更新世以来形成的岷江及其旁支河流夹带的泥沙等沉积物逐渐填充下形成的。而且大量阶地年代资料表明,至少四川境内地面水网的出现是中更新世后期以来的事件,故而,也不排除成都平原上有着冰水沉积的可能性^{[5]4}。此外,对四川盆地土壤分布的化学分析,发现在岷江中游的冲积土主要是第四系全新统河流冲积、洪积物^[8]。这些均说明成都平原地质年代有湖泊存在,但在第三纪末与第四纪初就消失了,在第四纪更新世以来的成都平原,是以河流沉积物、冰水沉积物为地层的主要堆积。

成都平原第四纪沉积厚度“盆地最深达500米以上,跨过断裂第四纪沉积厚度锐减”^{[5]1}。“由于新构造活动升降差异,致使平原沉降中心偏于龙门山前,沉降幅度由西向东减弱。据目前资料查明,中央拗陷接纳了第四纪松散堆积物60~540m,一般200~400m。最深的竹瓦槽基底埋深541.09m,海拔高度78m,地势最低”^{[6]173}(参见图1)。这说明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在中央拗槽,即新津西北、大邑西南、温江以南地域内,为主要堆积物,以竹瓦槽最低基底埋深来看,在第四纪松散堆积物之上,仅有1~2m左右的表土层,

我们画出邛崃—新津(A)、新津—温江(B)的剖面示意图,以说明问题(参见图2)。成都平原除了第四纪以来的大量松散堆积物外,便是表层的1~2m的耕土,这表明在成都平原,尤其是在新津西北、大邑东南、温江以南、成都西南这一中央拗槽区域,没有湖相沉积物的堆积,证明成都平原在第四纪有人类活动以来,并无周先生所指出的大湖泊的存在。

此外,考古发掘出的古城遗址也印证成都平原地层构造上没有湖相沉积。如成都金沙遗址地势平坦,“除表层为一层厚约1~2米的近代扰动土外,其它均为松散的第四纪全新世河流冲击物”^[9]。我们对比现已发掘的5座宝墩文化古城遗址,即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古城遗址、崇州双河遗址、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遗址,发现均有或多或少的第四纪全新世河流冲击物的堆积现象。这些都支持成都平原有着很厚的第四纪以来的河流及洪水冲积物堆积,地层中未见湖相沉积的遗留,自然也就不存在一个大型湖泊的观点。

那么,在新石器及青铜器时期,是不是重新短暂形成过如周先生所指出的大型湖泊呢?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在冰后期距今7000年前,全球的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冰川后退,此温暖时期延续了3~4千年,为冰川学上称为气候最宜时期或高温期。通过对考古发现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十二桥考古文化中成都金沙遗址的古气候分析,看到距今3000年前的成都平原与全球气候大背景是一致的,其“早期(相当亚组合I的时期,即第1~10层,0~242cm)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平原上生长着茂盛的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晚期(第11~14层,242~380cm)的气候虽然还属于亚热带气候,但较早期更加湿热,气温和降雨量都比早期高,平原上生长的草本植物种类有所减少,蕨类植物种类有所增加。定量分析了金沙遗址距今3000年的古气候:年平均温17.7~19.8℃,最热月均温21.7~28.6℃,最冷月均温11.5~11.9℃,年降雨量993.3~1113.3mm,最大月降雨量224.6~268.1mm,最小降雨量6.9~14.1mm。成都地区3000年前的年平均温比现在要高1.7~2.8℃,年降雨量基本和现在一致”^[10]。

可见,成都平原降雨量在近300年以来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加上距今300前其地面植被很是丰富,土壤含水性理应更好些。同时,地质年代的隐伏断陷湖盆也早已在河流和冰水冲击的沉积作用下消失了,那么在距今300年前重新出现一个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的“滇池”的可能性,应是微乎其微的。除非在当时新津峡口出现过大面积的山体塌陷堵塞了岷江,但这种情况无论在地质、考古调查或文献记载中都没有丝毫痕迹。而且,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堰塞湖的位置也不在周先生描绘的位置,而应该在新津—双流—邛崃一带三角形地区(如图3)。当然,鉴于平原河流的自由曲流特征,我们也不排除在成都平原东南低洼地带曾经出现过大小不一的暂时性浅表陂池或涝地地貌,不过这与周先生所说的大型湖泊不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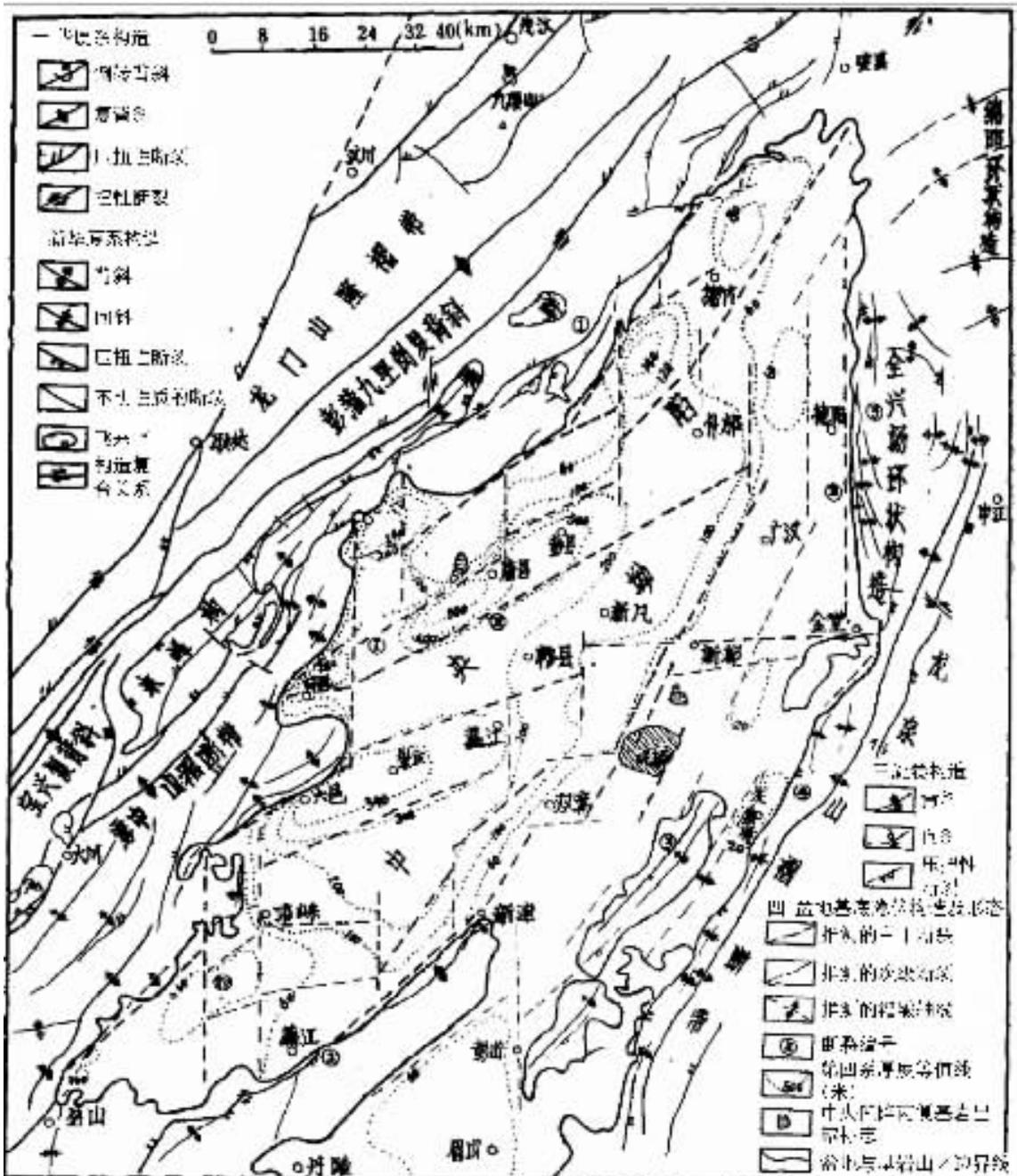


图1 成都盆地(平原)基底形态与构造及区域构造纲要简图

(本图采自何银武《试论成都盆地(平原)的形成》,《中国区域地质》,1987年第2期,第1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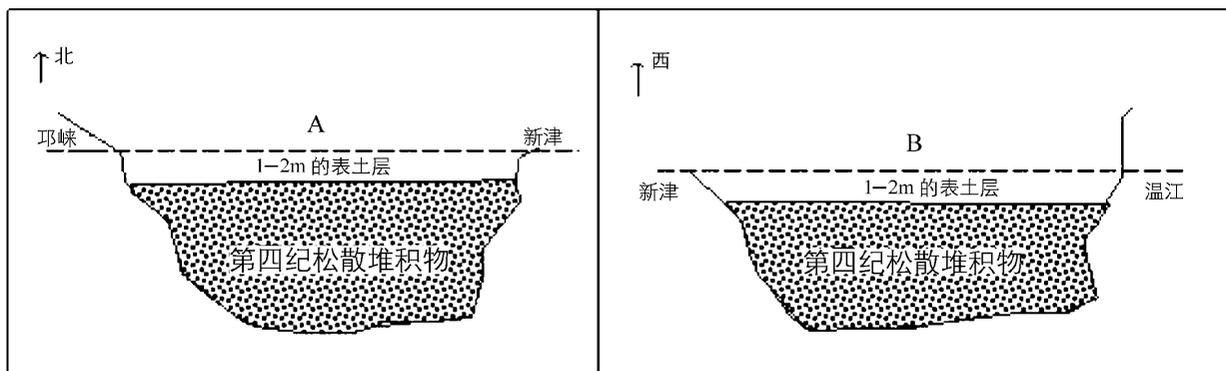


图2 中央坳槽邛崃—新津、新津—温江剖面示意图

此外,通过对金沙遗址区孢粉分析方法复原古植被特征,结合遗址区广汉亚粘土层古土壤的地球化学行为分析

结果,“金沙遗址文化期内气候总体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并有温暖湿润与温暖干旱气候交替现象发生”^{[9]70-74}。步分析考古发现的象牙,发现距今 2200 年以前的成都平原极可能就是亚洲象和犀牛的活动区域,之后则因古气候从温暖湿润逐渐变干旱,导致其数量锐减,乃至消失^{[9]70-74}。而且,金沙遗址区古河道砂的粒度分析表明,其“砂粒细小,说明河流水动力较弱。在古河道边有象牙堆积坑出露,说明当时古蜀人是在河边进行祭祀活动。联系当时社会人们祭祀求雨的习俗,造成水动力较弱的原因极可能是由于当时的降水量减少造成的。这反映遗址区当时古气候有变干趋势”^[11]。这样的干旱气候条件下,要维持一个 700~1 200 平方千米的大湖泊存续,其水源应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成都平原考古分析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依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初步划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与秦汉文化融合时期五个阶段^[12]。

属于宝墩文化遗址的古城,从 1995 年起先后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村古城遗址、崇庆紫竹古城遗址、双河古城遗址、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和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遗址等(图 3),文化内涵与三星堆一期文化相同。1997 年起,这类文化被正式命名为“宝墩文化”^{[12]6},其年代约为距今 4800~4000 年或 4500~37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

如图 3 所示,周先生划定的公元前 3 世纪前后的“滇池”范围,虽然介在宝墩文化各遗址及秦代县城之间,与古人居址似无冲突。但仔细观察,此“滇池”的安排并不合理。因为从地形看,成都—双流—宝墩—临邛一带地势最低,如果真有大湖,应该是以宝墩为中心呈东北—西南方向成湖,但这样一来,却与宝墩遗址的存在相悖,于是周先生只好将“滇池”向东北推移,以避免宝墩。这样的安排固然颇具匠心,但仍然未能解释宝墩的海拔高度只有 472~474 米,为成都平原最低,为什么滇池没能淹掉宝墩?莫非“滇池”是一个高出地表的悬湖?显然,宝墩遗址的存在,是“成都平原滇池说”无法摆脱的梦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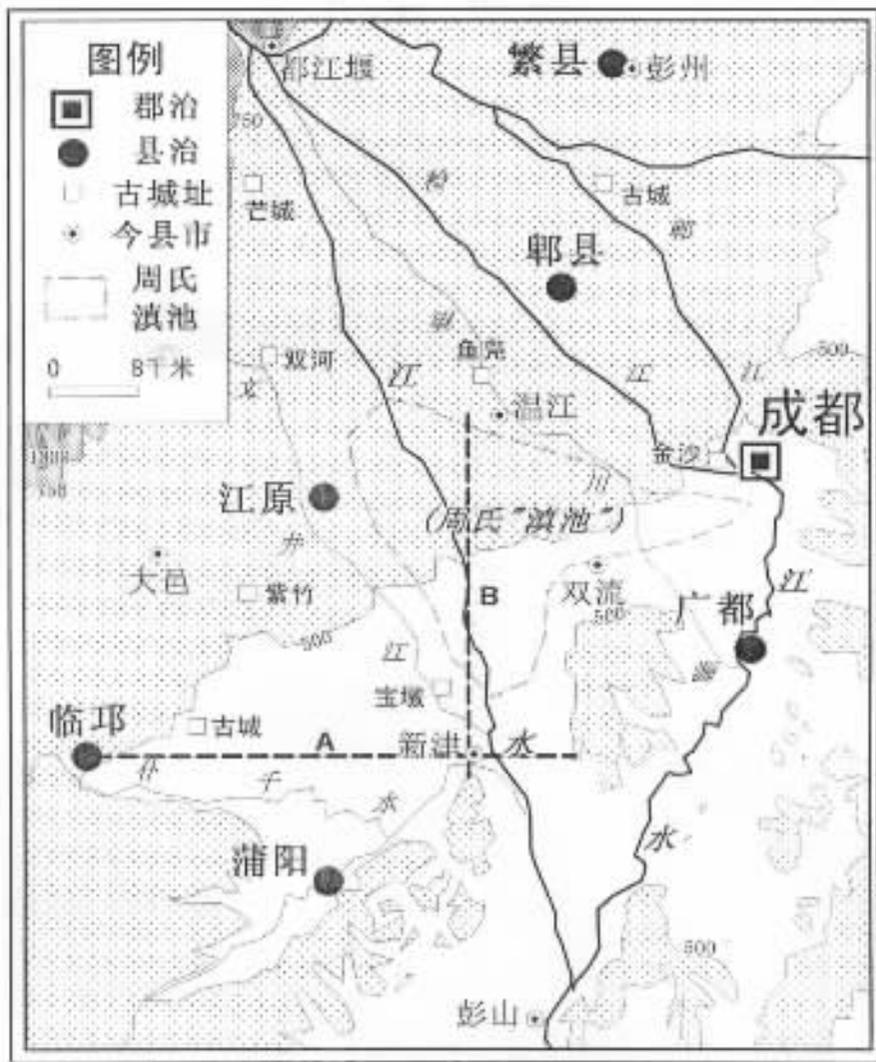


图 3 宝墩文化、金沙遗址及秦汉之际县城分布与周氏“滇池”的关系

另外,我们知道,自中更新世以来形成的岷江及其各水系,携带的沉积物不断堆积在成都平原,造成其地势倾斜西北高东南低。由于广汉粘土层透水性很差,加上排水不畅,流水极易形成漫流,这是早期古人类难以在成都平原东南部最低处建立城址的原因。但随后的河流冲击与沉积作用,在成都平原中心和边缘地带形成一系列高出河流的阶地,为了防止突发性洪水的侵袭,进入平原地区的人类,会把定居地点安排在平行于河流的台阶地上。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分布正体现了这个特点。目前已发现 8 座古城,相距约 20~40 公里,面积在 10 万~60 万平方米不等,城墙用斜坡堆夯方法筑成^{[12]6}。刘兴诗先生指出:“从新津龙马古城(宝墩遗址)可见,城址选择在平原南部片状分布的晚更新世广汉粘土台地上,较附近全新世平原为高。其它古城也有意识构筑在较高的位置。都有明显的防洪意识。这样的地形加以围堤式城墙尚不足以保障安全,只有一次次迁移。直至迁至种植条件稍逊,却可保障不再受洪水威胁,位于今日牧马山地区的瞿上古城方保无虞。由于洪水威胁,史前时期成都平原的流动筑城史,也就十分清晰呈现出来了。”^[13]

此外,宝墩文化古城的选址、建筑有其独特之处:“城址建于台地上,城内地表明显高于城外,且于台地边缘筑墙。……所占地貌均位于缓慢倾斜的冲积扇平原的‘扇面’和‘扇缘’上,坡降低,利于洪水通过,而且台城也易于防洪。”^[14]宝墩古城海拔约在 472~474 米间,“其城内外高差达 3 米,除了防御用途外,这或许是当时的一种防洪措施”^{[14]27}。这些古城大都建在河流之畔,进而形成了与河流相互融洽的局面,便形成了“诸城址的平面形状基本上与河流平行的现象”^{[14]27}。从这些城址的建筑特点看,其主要与河流的定期洪水有关。

这样,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活动主要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进而促使其在城址的选择与建造上均体现着要避免或抗击洪水的特点,也表明该时期的成都平原有着定期洪水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而非周先生所指出的湖泊可以带给人类的“恩惠”。进一步讲,即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成都平原并没有一个大型湖泊的存在,更不要讲延续到战国中期乃至秦汉两晋南北朝了。

同时,新修《双流县志》说:“葛陌:在双流县北 8 里金花、永福乡交界处。今为葛陌村。《元和郡县图志》载:‘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葛陌附近有井一口,县人呼为‘诸葛井’,相传诸葛亮曾汲饮过井中之水。大口井:在九江乡大井村,并在田中,相传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于此汲水灌田。水深三尺,常年不涸。今犹存。”^[15]这两个蜀汉遗址表明周先生所指的两晋南北朝时万顷池区域内已有蜀汉时期人类的耕田劳作,而周先生却指出万顷池“应是古‘滇池’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子遗”。退一步讲,

为何蜀汉时期的人们要用井水“汲水灌田”,却不利用现有的湖泊之水来灌溉田地?故而,笔者据此认为两晋南北朝万顷池,既不是如周先生所说为“滇池”的遗留,更不可能成为“滇池”在成都平原存在的依据。同时,万顷池也应是古人的一种夸大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有万顷之大,不然古人就要在湖泊中从事耕作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云南滇池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即石寨山文化,尤其是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它提供了新石器及青铜器时期人类傍湖而居的生活场景。这里简述如下:

石寨山在晋宁县城西 5 公里,高出地平面约 20 余米,西距滇池东岸约 1 公里。……螺壳层,是古代人类取食螺肉以后的堆积。其上半层接近褐灰土或表土处含有少量的细灰土,当是碎螺壳和上一层混合而成;下半层则为纯净的螺壳,不含任何泥土。……平均厚约 60 厘米。每一枚螺壳的顶端都被敲去一个小圆孔,这是挑取螺肉时必有的手续。……石寨山为滇池附近的一座小山,山西面田中有螺、蚌壳和积沙的遗存,因此我们推测它在早期是滇池中或池边的一座小山,后来地势变迁才形成陆地而距滇池稍远。^[16]

在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官渡、石子河、古城、兴旺村、河泊所、老街、白塔村、白塔山的调查中,也发现堆成高堆的螺壳层^[17],这充分说明生活遗存在证实傍湖人居对湖泊资源充分利用方面的重要性。但我们在周先生所指的成都平原“滇池”周边的上古人类活动的古遗址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遗存,这难道不是正好说明了该地域在上古时期是没有一个大湖泊存在的!

最后,通过分析已公开的 5 座古城发掘报告,我们发现文化层堆积分布上均有后代文化层,即汉代、宋代、明清文化层,表明在宝墩文化以后,人类依然在该古城遗址区域繁衍生息。假若有一个大湖泊的存在,那么人类的活动地域应该随着湖泊的生长期而迁徙,即随着湖泊的萎缩而有一个不断向湖泊中心地域内缩的过程,但在成都平原却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同时,这些古城遗址大都分布在岷江以及各支流旁,其中有些城址是与河流流向是保持平行的。这些均向我们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宝墩文化以来,难以持续存在一个大湖泊。

四、结 论

第一、成都平原在第四纪中更新世以前,在冲积作用下断陷湖泊便已经逐渐被淤平,也就不存在周先生所指出的地质年代遗留下的湖泊残存到战国中期的情况。

第二、第四纪成都平原有着很厚的河流及洪水冲积物

堆积,地层中未见湖相沉积,难以支持成都平原长期存在大型湖泊的观点。

第三、宝墩遗址的海拔高度在成都平原为最低,既然当时已有人居,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成都平原东南部没有大湖。

第四、湖泊的消长要影响到人类居住地的迁徙,但成都平原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只有随河迁移而无随湖迁移的现象。同时,云南滇池区域的上古时期傍湖人群居住遗址中,发现有大量人类对湖泊资源利用的遗存即螺壳层的堆积,而在成都平原的古遗址内却没有发现。因此,我们认为成都平原在上古时期不存在一个如周先生所说的湖泊,也就是说,“滇池”不可能在战国中期以前的成都平原存在。

参考文献:

[1] 西南夷列传[M]//(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45-52.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编.中国地貌图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地质矿产部《地质辞典》办公室编辑.普通地质、构造地质分册[Z]//地质辞典:第一分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

[5] 钱洪,唐荣昌.成都平原的形成与演化[J].四川地震,1997(3):1-7.

[6] 何银武.试论成都盆地(平原)的形成[J].中国区域地质,

1987(2):169-176.

[7] 吴泰然,何国琦等编著.普通地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温琰茂等.四川盆地土壤微量元素化学地理研究[J].地理学报,1983(4):358-371.

[9] 傅顺,王成善,江章华,等.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J].江汉考古,2006(1):70-74.

[10] 姚轶锋,李奎,刘建,等.成都金沙遗址距今3000年的古气候探讨[J].古地理学报,2005(4):549-560.

[11] 傅顺,叶青培,王成善,等.金沙遗址古环境状况的综合探讨[J].中国地质,2005(3):523-528.

[12] 赵殿增.四川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J].考古,2004(10):3-13.

[13] 刘兴诗.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J].四川文物,1998(4):34-37.

[14] 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分析[J].东南文化,1998(4):15-29.

[15]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成都方志网》.《双流县志》第二十七篇《文物》第三章《遗址》第六节《蜀汉遗址》.(<http://www.cdhistory.chengdu.gov.cn/html/xxym2.asp?ID=5742>)

[16]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43-63.

[17]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61(1):46-49.

责任编辑 张颖超

Discussion of the Dianchi in “Chengdu Plain” Stat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laeogeography and Archaeology

GUO Sheng-bo, LU Yan-zhao, XU Zhi-biao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r. Zhou Hongwei proposed that the sag pond formed at the geological age in the Chengdu Plain continued till the Western, Eastern Jin's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rom roughly A. D. 265 to 550). He took it as the evidence that the Dianchi Lake was 300 square miles and over 200 miles in circumference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urned to be a pond of the ten thousand square hectares in the Jin and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geology and archaeology and paleogeography analysis of Chengdu Plain,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since the Quaternary until the mi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can be no “surrounding 200 miles” of a big lake in the Chengdu Plain, so it can not be accepted that “Dian Chi” lake was in the Chengdu Plain.

Key words: Dianchi Lake; Chengdu Plain; Zhou Hongwei; Baodun culture